

# 刍议中国大学培养世界公民之内涵

彭 静

(重庆大学 a. 外国语学院, b. 高等教育研究所, 重庆 400044)

**摘要:**随着国际化的持续发展,各国大学都在越来越被赋予培养具有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的任务。因为大学与生俱来的国际性格及国家性格,中国大学背负着培养具有三重内涵的中国世界公民的重任。

**关键词:**国际化;中国大学性格;中国世界公民;内涵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3-0054-06

## 一 世界公民概念简析

(一) 欧洲文明的世界主义传统以及康德的早期世界公民思想

世界公民的概念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它的理论雏形可以上溯到15世纪前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基督教文化普世哲学,即基督教文化的世界主义。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那是一种交往开放、主动积极的海洋文明。古希腊人视自己为交往的主人、交往的中心,并支配着交往。而伴随这种交往心态的是一种自认为“世界中心”的文化心理,“在希腊人心中,希腊的就应该是世界的,希腊人不是希腊地区的主人而是世界的主人。他们以世界为家,是世界主义者”<sup>[1]</sup>。因此,欧洲传统文化是世界主义的文化。随着欧洲文明近代化并逐渐在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以普遍人性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主义理论更催生了全球化理论和世界公民概念。

在当代全球化理论诞生之前,许多西方学者业已对“世界公民”理念有所阐述,其中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康德的“世界公民”的概念。基于对人的自由的长期思考,康德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意味着人在社会中的自主选择 and 自觉行为,然而社会中自主选择和自觉行动之间并不完全协调和统一,

彼的自由可能就是此的非自由,即具体自由之间存在对抗性,而且这种对抗性在康德看来是由自然先天给定的,“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sup>[2]6</sup>。如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消除这一对抗性呢?康德给出的基本法案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公认的宪法社会。他说:“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sup>[2]8,9</sup>。在这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中,每一位成员都是世界公民,他们遵守同样的法律,遵奉同样的宪法从而实现同样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古希腊的世界主义文化传统和康德的世界公民设想奠定了当代世界公民概念的基础。

## (二) 国际化下的现代世界公民理念

20世纪最后一页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类已经进入包括经济、教育、文化以及政治等多个维度的加速变化阶段。在这个新的背景下,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更加突出,这使传统的国际关系模

收稿日期:2008-11-09

作者简介:彭静(1967—),女,重庆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式发生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这个过程及其固有的挑战。然而,尽管全球的国际化 and 现代化进程是一并发生的,但却在发展程度和态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简而言之,全球主义,或者是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这种排他主义和边缘化的社会氛围衍生出暴力、战争以及种族冲突,同时也造成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退化。在 21 世纪之初,相当大一部分人变得更加贫穷,正日益远离发达的、现代化的生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联邦发展计划》(UNDP)描述了一种“人类可持续发展”方案,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而且涵括了人性、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除此之外,美国联邦国际金融发展会议(Monterrey,墨西哥,2002年3月)强调了对团结因素的迫切需求——“la mondialisation de la solidarite”(全世界的团结)——和对京都协定的尊重<sup>[3]121-136</sup>。鉴于 21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是道德的重建,更是政治的迫切需求。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场域已经逐渐形成。1990 年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达仁道夫明确提出了建立“全球公民社会”理想的主张:“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需要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的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sup>[4]34</sup>

“全球公民社会”催生了现代世界公民理念的产生。现代世界公民应当具有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理想,尽管他们各自的历史理论需求和现实行为标准是多元化的,但在其实际行为评价层面上却遵循一元的规则。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具有共同利益,因此在理论本质上应该坚持某种同质意义上的全球性普世规则,但各地区和集团之间又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因此其在实际表现形式上却应是某种散裂意义上的本土化、区域化以及民族化规范。而世界公民正是生活在“全球公民社会”的遵守上述规则和规范的现代公民。

## 二 中国大学的任务与挑战

### (一) 大学的国际性格以及中国大学的任务

大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国际性格。中世纪欧洲大学创立伊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世界精神和超

国界的性格:拉丁语为各国教授学生的统一语言,普救派则试图在求知无国界的氛围下通过知识来整合世界。传授知识、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当今大学的三大理念,而这三者无不显示出一种基于科学思想与知识性格之上的“超国界”性格。“大学之为大学,即在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故每个大学的学人都可以像杜尼(J. Donne)一样说:‘吾涉身于人类之中’”<sup>[5]1</sup>。

而更令现代大学无法回避的是,新的全球背景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促使教研机构重新定位他们的任务和使命,去考虑创新教育策略以改善其功能。目前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大致上说已经下降了,因为目前高等教育所界定的个人能力仅局限于技术性的生产效能上。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21 世纪高等教育公告宣称:“高等教育——并教育各领域——应该为世界的需求而服务,致力于达成一个更加公正、宽容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sup>[6]</sup>既然我们已经达成教育是各种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的共识,那么新的教育政策和步骤也就应该提出。没有教育,就没有思想和社会的变革。高等教育应重新定位他们的任务和使命,去考虑创新教育策略以改善其作用。

今天的大学必须将国际环境下错综复杂的各类事物概念化。有关全球化自身的知识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智力需求,正如国际争端的解决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规划过程。我们必须革新我们的思考方式,这是一种模式上而非程序上的革新。于是,新的觉悟的产生——一种全球化觉悟——是这个革新的关键,它要求思想上的转变,因此教育模式的改变也不可或缺。21 世纪的教育政策必须始于一个普遍原则,那就是应该对有竞争力的教育标准的探寻,这种标准不但要具有国际水平,还要符合地方条件。而这些问题落在人才的培养这个中心问题上,便是各地区的高等教育怎样使得他们的毕业生成为“自己的世界公民”。

### (二) 大学之国家性格以及中国大学的挑战

除国际性格之外,大学还具有自己的国家性格。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任何大学都是立足于本国,为国家培养人才,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即大学作为一种国家组织而必须服从国家的议程,此即大学的国家性格。尤其是到了知识社会,作为知识的策源地和文化遗产之场所的大学已经成为一

国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志,其国家性格并不因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迅猛发展而有所减弱。自被西方的和东方的列强强行拖进现代化以来,中国大学一直在进行着国际化方面的努力。远如始于幼童留美至今仍不绝如缕的留学运动,近如方兴未艾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等。可以说自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以来就一直在追赶现代世界的步伐,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努力地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时至今日,中国大学已成为国际知识系统的重要一环,也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一个我们不愿面对但又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大学仍然是作为“边缘”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国际秩序”已经形成。而在国际知识系统中,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由于原发性的深厚积淀以及经济政治的优势而处于中心的位置,并与其所植根的文化互为依托,深刻影响着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

目前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大学怎样体现自己的国家性格,培养出兼具世界视野和民族认同感的公民。西方学术体系完全占据了世界知识的话语权,而在知识的产出和交流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这些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遂沦为西方理论之注解。而更为担忧的是,这种“中心对边陲的宰制”使得边缘国家的文化不仅在“失血”,而且在“消解”。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的大学生已不把向西方的学习单纯作为一种汲取知识的手段而更多是作为获得国际认可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国际地位以至于最后对其创造力的怀疑,而实质上体现的仍是一种文化认同感的缺乏。这与目前中国殚精竭虑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大趋势当然是相悖而行的,有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即“运用政治与经济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与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sup>[7]35</sup>。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着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即既要获得西方科学与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又要竭力维护本国的文化与知识传统,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而目前许多学者担心中国的本土文化可能正经历着最严重的忽视甚至是背叛,如果说在出于半殖民地境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为实用目的而在痛苦的嬗变中自我怀疑和否定,并进

行反思和追问,那么当今中国大学则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已经失去了自我怀疑的兴趣。

与此同时,文化民族主义的呼声从未停止,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如压弯的树枝的反弹(以赛亚·伯林语)。从博林布鲁克、卢梭与赫尔德到费希特、李斯特,民族主义一直是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今天的中国因为对民族复兴的渴求而使得民族主义更为人们接受和推崇。文化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还是儒学本位,其代表亦是新儒家学派。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早期新儒家学者曾站在“中国文化中心”的立场上以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建立了自己的终极关怀,重视“道德本位”,将道德生活内在于一切文化之中,并构成各种文化意识的灵魂。现代新儒家试图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粹,融合西方文化精神,以实现创建中国新文化的目标。然而,由于其文化保守主义和难以释怀的“文化唯我论”,使得他们对西方文化观的看法难免有所偏颇。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学者及后新儒家们修正了早期新儒家学者的儒学文化中心论,而强调“儒学是否能够和马列主义进行深入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sup>[8]28</sup>,以及儒学必须以平等的姿态与世界上的其它伟大思想传统对话,对儒学进行学理上的研究。以上当然是国学自觉的进步,但在当今的中国大学内,我们不得不存在这样的担忧:我们希望的是看到孔子与柏拉图之间的问礼,然而事实上出现了非理性崇拜。

面对以上挑战,中国大学必须做出应对,培养自己的文化传承者和民族社会建设者。

### 三 中国大学所培养世界公民的内涵

中国大学必须培养“中国的”世界公民,即所谓“中国世界公民”。中国世界公民具有三重内涵,即“中国”、“世界”和“公民”。

(一)第一重内涵:自由民族主义意识和儒道兼修的传统文化人格之现代体现

民族主义是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不是仅仅一种将来或可实施的理论,而是今日世界的一个推进力。民族主义的经典定义是:“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sup>[9]3</sup>。伯林概括民族主义的四大特征是:坚信归属一个民族的压倒一切的要求;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的有机的关系;保持某一种特殊的信仰、追求某一种特殊的政策、服务于某一种特殊的目的、维持某一种特殊生活的一个理由、或许是最

有力的理由,就是这些目的、信仰、政策、生活是“民族的”;最后,在诸多争夺权威或忠诚的竞争者中,民族的诉求是至高无上的<sup>[10]6</sup>。

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世界公民,首先要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感,对中华文明的熟稔以及高度的文化担当。要真正了解本土文化从何处溯源,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而曲折于此,并在此基础上使本土文化和认识哲学逐渐为现代世界认识并接纳。为达到此目标,中国的大学就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价值和培养体系,而不应只是一味徒劳地嫁接西方大学的理念。中国的大学始终应贯彻的一条准则,就是必须培养“中国”的人才,即使他是面向世界的“世界公民”,但其精神家园仍应是华夏文明。因此,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氛围应始终贯穿在中国大学的各个角落,21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再是“欧洲大学的凯旋”,而更应该是寻找失落在历史上书院角落里的民族性格和学术精神,并对照西方大学的现代精神治疗其现代性缺失从而使之强健和健全,而这一民族性格和学术精神正是构成中国世界公民的文化脊梁。

而自由民族主义意识又体现在什么地方?个人认为,对传统文化人格的传承是关键。钱穆认为,中国的学问传统具有三大系统:第一系统是“人统”,即“学者所以学做人也”;第二系统是“事统”,即“学以经世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即纯学术的研究与探讨<sup>[11]225-226</sup>。不难看出,西方现代大学之自治、自由理念偏重于第三系统,而中国的学术传统偏重于第一系统,即“尊德性”,这与几千年奉行名教的统治思想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大学理念源于西方,我们的大学也是向欧美不断学习发展的结果,因此钱穆先生所说的第三系统理应得到弘扬。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要淡化甚至忽视第一系统,因为这是国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是不能也不可能被割断的。中国五千年来一直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体系和文化人格,要培养自己的世界公民,就必须很好地传承这一文化人格。诚如南怀瑾所言:“儒家像粮食店,决不能打”,否则“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可以随意逛逛;道家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都可以不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不可”<sup>[12]6</sup>。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格也是积极而富有张力的,儒家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道家人格所谓“为而不恃,

功成而不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二者有着完美的互补和衔接,通过儒家教育,求知问学,经世致用;再通过道家的教育,洞见本性,返璞归真。在当今国际化背景下,儒家伦理的天下归仁、世界大同、执两用中、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扶贫济弱等金律,及其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本质,不仅国人不可或缺,更是创建和谐世界的必需。

(二)第二重内涵: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下的多元文化宽容和全球视野培养

多元文化价值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伯林,其纵贯了俄罗斯、德国浪漫主义、英美自由主义等文化传统,受到犹太、基督教等多元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现代性问题中重要的文化多元问题。价值多元观念的意思是,许多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地多样化的;这些多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柏林曾说:“人类的天性并非始终不变的铁板一块,那么,同样的真理在不同的人群眼中也就不会永远相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赫尔德称之为‘Schwerpunkt’。因此,相信每个人类社会都坐在一辆名叫进步的大篷车上驶向同一地平线这种想法是难以理解的。”<sup>[13]333</sup>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价值多元的认可和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多元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国世界公民的培养之意义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肯定和坚守,其次是对异质价值理念的尊重与理解。多元价值否定了古希腊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人类上世纪经历两次人为的巨大灾难后,痛苦地发现通天塔已经无法重建,既然价值观念已经生而多元,外力不可捏合,就只能保持和互相尊重。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世界公民应把中华文明当作自己栖息于地球村的身份认证,这个认证是与生俱来,也是唯一的。既然不同文明的重心各有不同,甚至有时相互冲突,而又不得不彼此共处和共同发展,因此一种新的视角——全球化视角是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世界公民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汉维曾将全球化视角分为五个维度进行描述,即跨文化意识、有关全球动态的知识、世界状况意识、视角意识以及对人类选择的关注<sup>[14]37</sup>。全球视角将导致认知的变革:从国家观念到国际意识,从传统的思考方式到更为理性的思考。当面对一个协调的全球系统的需要时,单一民族国家在洲际政治上的主要参与者角色受到了质疑。个

人应该成为世界公民,应具有对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敏锐意识,同时还应能够对其他文化产生强烈的共鸣。他应该被告知当今世界的状态和社会政治原则,由此使其产生更强的责任感,去投入到一个更加完美的社会的建设中去。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和个体的丧失,而是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的获取。

基于全球视野,本奈特为高等教育设计了六大教学目标,我们可以以此为借鉴,作为中国大学世界公民教育课程的普遍基础。这六大目标分别是:对多重视角的理解;发扬文化意识;鼓励不同文化间的竞争;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以及各种形式的歧视行为;提高对世界动态和全球形势的关注度和提高社会活动技能<sup>[15]132</sup>。这些课程目标体现了对全人类和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十一世纪教育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也相一致。因此,我们应将拥有全球视野作为国际化下中国大学培养自尊、开放、自强的中国世界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第三重内涵:发轫于西方社会的公民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公民思想之融合

现代大学和现代公民理念均发轫于西方。纽曼认为,大学教育,或更确切地说,博雅教育,创造的是自由、自治的个体,独立于世俗的羁绊,因为个体只有完全将自己的思绪屈服于理智的沉思才能称之为完整的人并获得自由,而博雅教育也是公民的教育。社会学家马歇尔在其著名的《公民资格与社会等级》(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公民资格概念。他认为,公民资格具有三层基础:民事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民事基础由个体自由的各种必要权利——个人的解放,言论、思想以及信仰的自由,拥有私人财产以及履行有效契约的权利和求得公正等组成”,与民事公民身份联系最密切的机构是法院;政治公民身份意味着“作为政治权力当局授权机构的一员,或是该机构成员的选举者参与政治权力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社会公民身份表示“对从少量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权利,到全部社会遗产,再到根据社会当下普遍的标准有教养的生活等全部范围”,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机构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部门<sup>[16]36-38</sup>。从以上观点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现代大学和现代公民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而现代公民理念又基于以下各理念: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以及对政治国家之认同。

中国大学百年来一直处于学习状态,历经五四运动、10年动乱以及改革开放,迄今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已经没有留下太多传统文化的痕迹。诚然,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西方开启了现代文明方案,但疑问是拥有完整的文明体系和五千年不间断文化谱系的中国现状是否能够完全运用西方理论体系由外而内的进行审视?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公民教育课程中的核心概念“国家”与“人权”,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在西方社会科学论述中,所谓的“国家”这个概念是由同质性的空间切割而成的观念,西方学者对“国家”的定义都充满了各种断裂的空间或组成部分之间某种“断裂的氛围”。例如: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体现,凌驾于特殊利益之上,因而能够克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以及个人作为私人和市民之间的分裂。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国家”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认同。而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家作为文化认同的意义更为突显。如明末大儒顾炎武曾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sup>[17]379</sup>可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家”不只是有一套权利义务所规范的契约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民族共业。同样,当代学界所热论的“人权”概念,其实也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这是一种基于天赋人权和人生而自由的权利本位的道德价值(Right-based mortality),强调个人权利的合法性与不可剥夺性,其更多的在个人与国家的对抗历史中被论述。而中国传统的公民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君臣父子”、“天下为公”等道德本位的道德价值(Virtue-based mortality),强调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责任和天职。因此,可以说,西方公民概念以权利和对立双方契约为中心,而具有深厚宇宙论基础(诸子百家思想均有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注重个体义务以及个人与自然、社会、国家之间的整体性、统一性以及和谐性。

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民观念尽管有着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缺失,然而作为一种强调统一、和谐的朴素宇宙观,其对受困于工具理性和市场伦理的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着莫大的意义。鉴此,中国高校公民课程在传输现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同时,还应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民道

德理念,并进一步实现两者之间的融合。

### 参考文献:

- [1]张政文. 欧洲世界主义传统、康德世界公民理论与全球化[J]. 世界哲学, 2005, (1).
- [2]康德.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M]//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0.
- [3]Jocelyne Gacel-Avila. The Internati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 Paradigm For Global Citizenry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l Education*, 2005.
- [4](英)拉尔夫·达仁道夫. 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M]. 林荣远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5]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6]*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8, October 5-9).
- [7](英)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M]. 冯建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8]方克立.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 [9](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李金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0](英)以赛亚·伯林. 犹太人的奴役与解放[M]. 秋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1]钱穆. 有关学问之系统[C]//中国学术通论. 台北: 学生书局, 1977.
- [12]南怀瑾. 南怀瑾选集: 第二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13](加)伊格纳季耶夫. 柏林传[M]. 罗妍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4]Hanvey, Rx. *An attainable global perspective* [M]. New York: American Forum for Global Education, 1982.
- [15]Bennett, C. *Comprehensiv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M]. Boston: Allyn & Bacon, 1995.
- [16]Marshall.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M]. London: Heinemann, 1963.
- [17]顾炎武. 日知录: 卷十七(原抄本)[M]. 台北: 明伦出版社, 1970.

## Discussion About Cosmopolite Cultivation by China's Colleges

PENG Jing

(a.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b.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ll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entrusted with a mission to cultivate cosmopolites of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China's cosmopolites of three intensions because of their inborn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ese college character; China's cosmopolites; intension

[责任编辑: 凌兴珍]